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 国语运动与马来亚想象 ——鲁白野的语言意识形态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and Malayan Imagination:  
A Case Study on Lu Po-yeh's Language Ideology

吴小保  
(GOH Siew Poh)

## 摘要

上个世纪50年代, 马新华社面对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渐渐地从中国认同转向马来亚认同, 并掀起了一波学习国语的运动。本文尝试以鲁白野的文化实践为个案, 探讨他在独立建国时期的马来亚国族想象与国语运动的参与, 最后讨论其语言意识形态, 以及该观念如何与马来知识精英起冲突。

**关键词:** 马来亚、国语运动、鲁白野、马来语文菁英

## Abstract

During the 1950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encountered a new historical phase. They gradually shifted their loyalty from China to Malaya, recognized it as their new homeland.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which promotes the learning of Malay was uplifted among them during that time. This paper is a case study on Lu Po-yeh, a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activist. It focuses on his stand in the Malayan imagination and his involvement 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It also discusses his language ideology which collides with the view of Malay elites.

**Keywords:** Malaya,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Lu Po-yeh, Malay elites

## 一、前言

二战之后，马来亚与新加坡掀起了反英殖民统治的运动，争取国家独立自主。此时，华社也面对身份认同转向，渐渐地从中国认同转向马来亚认同。（崔贵强2007）从历史角度看，这样的本土认同是延续自二战前，20年代马华文学的南洋色彩口号、30年代马来亚地方文艺的提倡，乃至二战之后，1947、1948年的一场“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大论争”等（方修1986；1987），这都是华人在马来亚的在地认同的历程。只不过，二战后与过去不同的一点是，它牵涉到了“国家”的层面，因此也意味着涉及到马来亚文化的建造。<sup>1</sup> 在这个建造过程中，其中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置多元语言的问题？置于华社的语境中，则是：应该如何处置华语与马来语的地位与关系？

1957年马来亚独立、1959年新加坡自治、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马来文被规定为国语（Bahasa Kebangsaan）。语言地位规划使得马来文渐渐为国人重视，在国家领导人、知识分子、学生等的引导下，马新华社掀起了学习（马来语）国语的运动。例如，当时新加坡政府透过各种措施推广马来语，如成立马来语文文化协会、规定在政府学校任教的教师必须具备第一级马来语程度、公务员则是第二级马来语程度、开办中学程度马来语课、成立马来文源流中学。此外亦举办国语月和国语周运动、增添马来语广播时间、政府公告与公文开始使用马来文等等。（郭振羽1996：60-61）在民间方面，亦自行举办各种活动来配合官方政策，例如各地纷纷开办夜校、黄昏班，出版大量的刊物等。南洋大学是当年华社推广国语的重镇，曾开办马来语夜校班（1956-1958），自1958年3月起马来文纳入大学课程内作为选修课，1968年设立马来学系。此外，南大生也积极参与到出版业务中，例如编辑出版《大学论坛》等。<sup>2</sup> 然而，从更长时段的历史来看，



这其实是华社经历的第二次国语运动，在二战之前华社因为其内部需求以及后来的外在因素（如中国政局）影响，曾经历过（华语）国语运动。两次的国语运动，尽管在性质上有相当的差异<sup>3</sup>，但都对华社的语言观念起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而这种语言观念是一种多元结构的语言意识形态。

本文拟以50、60年代一位重要的双语文化人鲁白野（1923-1961）作为讨论的个案。鲁白野本名李学敏，其他笔名包括威北华、楼文牧、越子耕等。生于1923年霹雳州怡保，流浪过多个地方，从怡保到拿乞、万里望、金宝、新加坡乃至印尼。二战后从印尼重返新加坡，适逢默迪卡口号响彻云霄而拿起笔杆参与到国家的文化建设工作。鲁白野的文化实践横跨马华文学创作、普及化南洋研究和马来语文推广三个领域，并曾以各种笔名出版《狮城散记》（1953）、《马来散记》（1954）、《马来散记续集》（1954）、《春耕》（1955）、《流星》（1955）、《马来民族的诗》（1957）、《马来亚》（1958）、《实用马华英大辞典》（1959）、《印度印象》（1959）等，著述丰富。于1960年起，同时担任《马来语月刊》（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和《星洲日报》马来文副刊《国语周刊》的创刊主编。这两份刊物在鲁白野于1961年逝世后由其他人接棒，往后持续出版了十年。

本文拟将鲁白野在独立建国时期的文化实践，置于马来亚国族想象之构建的脉络中，探讨当时他的马来亚想象、国语运动的参与，以及其语言意识形态。从鲁白野的著述看，他是透过历史关系、阶级认同与语言推广三个面向，把多元化的马来亚各个族群统合起来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共同体。下文将先从这三个面向着手分析，梳理鲁白野的马来亚想象，以及他的国语运动的参与，然后再透过《马来语月刊》中的一场小争论，分析其语言意识形态，及其与马来语文菁英的价值冲突。

## 二、华人与马来人的历史关系

曾经一度相当蓬勃的南洋研究，在二战结束后，却一时沉寂下来。当

时《南洋学报》主编许云樵那么说道：

战后南洋，一切未能恢复，文化事业也不例外。战前经专家们苦心苦诣建设的南洋研究的机构和刊物，如狂风扫落叶地全都摧残了。再要重新建设起来，其艰难困苦，自不下创始时。

（转引自章星虹2015：112）

尽管一切都毁了，但是战后的政治与经济大环境的发展，却提供了有利的重建条件。一方面，二战刚结束，反殖民浪潮迅速席卷亚洲，英国在重返马来亚之后着手宪制改革、推行本地化政策，培养亲英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经济的复苏渐见起色。因此，马新两地的文化事业迅速扩大。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许云樵一方面延续战前的学术工作，恢复《南洋学报》的出版，另一方面他和南洋学会同道，如陈育崧，都意识到普及化南洋研究的重要性，而决定出版定期刊物《南洋杂志》与少儿报纸《马来亚少年》。这两份刊物为战后南洋研究搭建了一个普及平台。（章星虹2015：113-115）

受到此普及化南洋研究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二战之后出现大量的史地书写著作，题材包括了人物志、史地掌故、风土民情等。从马新史学的学术史角度看，这正是南洋研究经历第一重历史意识转移时期<sup>4</sup>，人们尝试摆脱外来的影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摆脱东南亚、马来亚史之中国性，例如各类书刊名称都从“南洋”、“华侨”改为“东南亚”、“华人”；另一方面，透过对东南亚、马来亚史之奋力创作，夺取历史发言权。（廖文辉2011：122-123）

鲁白野的史地书写，与南洋研究在二战后的复兴有直接关系。他的《狮城散记》、《马来散记》、《马来散记续集》与《马来亚》等著作，大致上是在上述脉络下完成的。<sup>5</sup> 透过对历史的梳理，鲁白野尝试探索一种与在地建立连带关系的可能性。一开始他也许对建构马来亚国族的必要没有自觉，但却已相当地清楚知道要维护、促进华马两族的友谊关系的重要性。<sup>6</sup>

鲁白野的史地书写，包括了历史典故、风土民情、地方志、人物志



等。《狮城散记》的出版是其实践的起点，当时他从印尼归来已将近六年。如上所述，此时民族主义浪潮渐渐成为主流，对华社影响甚大。然而，在50年代初期，身份认同转向还处于过渡阶段，尽管鲁白野已有明确的在地认同，但政治认同方面很可能跟大部分人一样心向中国。因此，他在书中提到“我国”、“国语”，都是指“中国”、“华语”。<sup>7</sup>在后来出版的《马来散记》和《马来散记续集》也是如此。这样的情况一直到《马来亚》才有变化，此时马来亚业已独立、新加坡则即将取得完全自治，顺应局势发展，“我国”变成“马来亚”，“国语”则变成“马来文”。

尽管史地书写或南洋研究，乃是当时知识分子大规模的文化实践，鲁白野并非特殊个案，但这不表示其出发点就必然与其他人一致。《狮城散记》这么记述：

我还记得那些在印尼大地上流浪的日子，听到了我是从海的彼岸渡过来的野孩子，他们很亲切很热情地紧握住我的手，这是因为他们曾经听过不少故事，说十二年前日寇的魔手擒住了这狮子的岛，污了它底坚贞的时候，这里的忠诚的人民曾为了反抗鬼子擎起了枪向他们射击。听了这一些隔着海岸的声音，他们感动而淌出了热泪来，把我拥抱得紧紧地，紧紧地。星加坡，到底是一个英雄的城啊！……

于是，印尼人常以羡慕的眼看着我，一个从星加坡来的野孩子。我，就会为了这段史略而骄傲过！

（鲁白野1953：1）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鲁白野的身份认同的塑造，与其在印尼流浪的经验密切相关。上文所见，在他者（“印尼人”）注视下（“羡慕的眼”），尽管身体与新加坡隔了一段空间距离，但在身份上却是紧紧相系的，从而让他为自己所来自的地方的一段史略（抗日战争）感到骄傲。因此，印尼经验成为了他在地认同的重要资源，并促使他回望自己的成长之地：一个在百余年间，从荒芜小岛发展到今日繁荣盛世，当中大部分是刻

苦耐劳的华侨先贤的血与汗与泪的印记，他由此生起感怀之情，因此，书写历史的动机，乃是基于一种感念之心，不欲忘记先贤的贡献，而奋笔疾书为其作记录。另一方面，书写历史，除了是对先贤的感念（因此不欲忘记历史），同时也是对土地的爱的表征——相比起印尼，“但我更爱马来亚……因此，我时常告诉自己，要好好地替它写一部传记哟！”（鲁白野1954a: 2）

史地书写除了上述两个原因，还有第三点，而这一点跟他对历史的功能认知有关：“我们不应该认为读史是一件不重要，甚至是落伍的事情。如果中马两大民族能够重温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深挚友谊，我们将会感到民族间的隔阂是更容易消除的而亲热起来了。”（鲁白野1954a: 124）换句话说，历史的书写与阅读，其实就是民族主义的文化实践，它的一个重要功用就是作为沟通华巫之间的桥梁。

上述从鲁白野散落在各篇文章中的文字梳理出他对历史的三种看法<sup>8</sup>，下文就其自身的实践做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鲁白野在《狮城散记》、《马来散记》与《马来散记续集》，梳理了马新两地的早期历史事迹、掌故、人物志等，例如〈十九世纪的星洲华侨〉、〈马来民族的形成〉、〈马车夫之乱〉等。在这众多的主题中，有一个面向相当值得关注：他如何看待马来人？又如何看待华人？这两个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为同一个问题：马来人与华人是否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

基本上，鲁白野对马来人的历史认知，主要是接纳自西方殖民地学者的观点，认为马来人的起源来自中国云南。

这就是马来民族，不但与我国云南的边疆民族（像掸族、大西南的苗瑶、台湾的蕃族）具有相同的民族特质，如体格、面貌、风俗、服装、言论等，都可以见到有相同的地方。因此，热心研究东南亚史前历史的西方学者，像法国的伯希和、荷兰的费勒克及英国的温斯德博士等，都承认马来民族最先是来自云南与安南的交界。

（鲁白野1954b: 144-145）



他们的体格、面貌等人种上的基因，以及风俗、服装与言语等文化上的基因，同样来自云南，来自中国云南的边疆民族。这样的中国起源论，还有其他的例子，比如他对影子戏的分析，再一次把中国与马来亚的文化作渊源上的考察：

爪哇的影子戏始于公元八六〇年，而我国的影子戏在汉朝便有演出。汉武帝为爱妃溘然逝去，悲痛得很，便有术士替他用灯在帐上照出伊人的倩影来。……在开映前，爪哇人一定要燃烧香烟，向祖宗鬼神祷告，要求降福。这种宗教意味，大概还是汉武帝向其夫人祈告而传下来的。

（鲁白野1954b：244）

从影子戏的发明到影子戏附属的仪式（燃烧香烟），都直接与中国起联想，从结构上的相似，直接指出其渊源上的收受关系，但这样的联想是毫无实证可言的（否则用不上“大概”一词）<sup>9</sup>。无论如何，透过这样的方式，中马两大民族在文化上有了更紧密的关联。

中马之间不仅有着上述的相连，还有着政治启蒙上的收受关系。在〈郑和下西洋〉一文，鲁白野谈到了中国如何协助马六甲立国：“郑和可以说是创写马来亚现代史首章的第一人。……以后郑和每次南来，必驻节于马六甲。是他极力游说拜里米苏刺，带他回到中国，向中国文化学习，包括朝廷礼仪、生活习惯，及政治思想，奠定了马六甲国政治制度之基。”（鲁白野1954a：9）

从上述所见，鲁白野的史地书写在华人与马来人之间，探索出了一个历史上的渊源，而这种历史的关系是建立在：人种起源、文化与政治启蒙的收受关系。因此，双方是有关联的，而非毫无关系的，是兄弟民族，而非敌对者或竞争者。这也因此有利于（往后）把双方想象为共同体的努力。

### 三、工运政治化与阶级认同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彼时举国欢庆，鲁白野在散文〈黎明前的行脚〉的开头，这么记述：

是怀着希望，是怀着美丽的憧憬，我和凤子终于在马来西亚得到完全独立与自由的黎明前，踏上北行的康庄大道，要看看半岛在破晓时节的情景，要看看咱们的祖国怎样敲起独立的巨钟，要听听老百姓在说些什么话。

（威北华1959：122）

此时文中的“祖国”，指的是马来西亚。实际上，在这之前，为了迎接默迪卡的到来，他已积极地拿起笔杆大力创作，在马新各地报刊如《中国报》、《星洲日报》等，发表各种文章，最后再结集出版《马来亚》一书。在撰写书中若干文章时，可以确认的是，鲁白野此时已清楚地明白，建立新国族身份的必要。因此，这本书不仅仅谈历史，而且还谈经济、政治等课题。

《马来亚》一书分十个章节，前三个章节题目分别是“马来亚史的发展”、“马来亚地理丛谈”和“在跃进中的人口”，可以这么说，他尝试透过时间（历史，从史前马来亚到独立前夕）与空间（地理，天然地形、地理位置的优位性等），为这新兴的国家赋予一个统一完整的躯体与意识。当然，还有这个新兴国家的主人：华巫印三大族群。书中后来还特别开辟一个章节，讨论“马来民族的本质”，可见他对作为主体民族的马来人，给予一个重要的位置加以关注。

《马来亚》一书值得注意的是，全书花了相当的篇幅探讨马来亚的经济制度，包括土地法、农业状况、矿业生产、贸易等等，从其对经济课题的关注来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的意识形态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这一点可见于他对“劳工运动”的讨论。

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了我国的经济繁荣。但是，在我国早期建设



中立下最大功劳的工人阶级，不但没有享有这美好的成功果实，他们流血汗艰苦劳作，甚至是献出生命搏来的反而是悲惨与可怕的辛酸命运。

（鲁白野1958：132）

文中指的是早年以犯人身份与猪仔身份被英殖民者引进马新的印裔劳工与华裔劳工。当年的劳工披荆斩棘、终日劳苦工作，却只换来菲薄的酬劳，遭到严重剥削。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会组织与团体纷纷出现，例如1869年创立的北城行，是马新最悠久的工团组织，代表粤帮建筑工人。工运在二战后蓬勃发展起来，鲁白野显然注意到工人阶级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并对此寄予厚望。对他而言，工会运动主要目标是维持工人阶级的利益，改善工人的待遇、工资与福利。但是，工会运动绝对不可以去政治化，工人阶级必须关注政治、介入政治。政治化工运的一个理由，是因为担心若政府被资本家、反动分子或伪装的社会主义者所掌控，则意味着工人在政治权力上失去依靠，从而威胁到工运的制衡体制的政治力量。因此，他认为，“我们若要维护民主，要见到马来亚成为一个自由与不独裁的国家，本邦的工人阶级必须发展一个强大的与独立的工会运动，因为工会是现代民主最重要的一部分。”（鲁白野1958：139）

然而，在鲁白野的观点中，工会除了是作为制衡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领域，捍卫各种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工会运动所强调的阶级认同，也被认为有助于国族身份的建构，透过共同的阶级认同，可以弥补族群之间的隔阂，使得人民团结一致。

在原则上，工会组织是完全没有种族或宗教信仰色彩的。因此，通过工会运动，是可能促进我国各民族的精诚团结。强有力的工会运动，不但能为马来亚人民谋幸福美好的前途，亦可能催促真正的社会主义在我国土地上萌芽壮大，甚至催促福利国家的诞生。

（鲁白野1958：139）

如同当时左翼民族主义者，他们深信阶级的认同可以打破族群的藩篱，只要掌握了马来语文的能力，一个统一的马来亚国族的建立不是不可能的事。

#### 四、国语运动与跨族群合作

华人参与马来语文的活动，可追溯至15世纪《满刺加国译语》的出版为起点<sup>10</sup>，此后经历了数百年的空白期，至19世纪中末期又开始延续下去。当时大量华人南下，基于生活所需，新客华人编辑出版了雏形词典，如《吗黎话》（1849）、《通夷新语》（1877）等。与此同时，峇峇华人则从事峇峇马来文学的翻译与创作，他们的文化活动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渐渐式微。另一方面，在20世纪20、30年代，新客华人除了编雏形词典，进一步地从事马来班顿的翻译。二战后，40年代又有马来新文学的中译介绍。至50年代，在爱国主义思潮影响下，以汉化土生华人为主导，掀起国语运动的热潮。当时的学习马来语文的风气以南洋大学校园为中心，引领整个华社投入国语运动中。

鲁白野是个马来语专家<sup>11</sup>，在推广马来语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早在印尼期间，鲁白野就已经意识到华人学习马来语文的重要性，在《实用马华英大辞典》的〈序〉中，他指出：“本辞典的出版，是编者十多年来在做美梦的实现。最先向我提议编辑这部辞典的挚友K安华（按：即Chairil Anwar）今已长眠爪哇岛的荒原上。人生沧海桑田，有时回想起来，未免要感慨万分。”（鲁白野1959a：1）文中的K安华是印尼著名年轻诗人，于1949年辞世。从印尼归返新加坡后，在《狮城散记》中他又透露希望自己可以有个安定的生活，以便可以编一本马华词典。关于华人学习马来语文的重要性，他这么说道：

中华民族和马来（印尼）民族的交通，最少也有一千年的历史。在马来亚，华侨人数虽占全国人口的四十巴仙，精通马来语的人数却是寥寥无几，实在比不上印尼华侨的努力了。我们如果诚恳地认为中马两大民族间的隔阂及歧视必须消弭，我们首先就应该



学习马来语，这是沟通两大民族的友谊及亲密合作的最佳的桥梁。

（鲁白野1953：67）

马来亚独立后，马来语被尊为国语，鲁白野也因其优异的语言能力而备受重视，在这方面他获得了星洲世界书局的鼎力支持。<sup>12</sup> 1957年，鲁白野出版双语的《马来民族的诗》，书中编译五十余首马来班顿，以纪念国家独立。1959年出版《实用马华英大辞典》。1960年1月20日，鲁白野（Lu Po-yeh）与马来作家阿都拉胡赛因（Abdullah Hussain）<sup>13</sup> 联合主编双语刊物《马来语月刊》（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同年，4月8日，他在《星洲日报》主编马来文副刊《国语周刊》（Mingguan Bahasa Kebangsaan）。在鲁白野参与的推广国语运动中，他涉足翻译、词典编撰与语文学习刊物的编辑。这当中，《马来语月刊》的实践相当值得注意。一方面，这是一份面向大众的学习马来语文的综合刊物。另一方面，这份刊物在当时建立了一个跨族群合作的平台，在此指的是，首先它采用华巫联合编辑的方式，其次此刊物在鲁白野主编期间获得不少当时马来文化界重要人物的注意，还特为他们供稿。这两个特点，都与《马来语月刊》的创刊宗旨相符合。

根据《马来语月刊》创刊号的〈发刊词〉，马新社会掀起学习、研究马来语的热潮，主要与三件事有关。首先是1956年的第三届马来语文大会提出了“语言是民族的灵魂”（Bahasa Jiwa Bangsa）；其次，马来亚独立后，马来语被宪法规定为国语；最后，在李光耀领导下，新加坡政府积极提倡学习国语。因应此时的国语学习热潮，《马来语月刊》同仁捐起了推广国语的责任，创办这份双语刊物。其宗旨有二：第一、帮助华人学习国语；第二、促进华人与马来人的交流。（〈发刊词〉20/1/1960：3）<sup>14</sup>

在“帮助华人学习国语”方面，《马来语月刊》刊登了许多语言学习的知识，例如“单词与说话”（Latehan Tutor-kata）、“马来书信”（Surat-menyurat）等，也编译“新闻天地”（Warta Berita）作为学习的材料。此外，也刊登国家领袖的言论，鼓吹爱国主义思想。例如创刊号

就刊载了东姑阿都拉曼的〈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Mustahak Menjaga Persatuan Nasional)。然而,读者似乎不满意太过侧重于语言与政治的编辑方针而去函投诉。鲁白野在《马来语月刊》第三期的〈编者的话〉回应道:“有些读者来信嫌刊物的内容太过侧重语言与政治,其实,这也不尽然。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尽量广泛采用综合性的材料,不但要介绍文艺,诗歌与艺术等严肃的文章,亦采用轻松内容的趣味读物,不但要认真学习,亦可以通过学习生活得到娱乐。”(20/3/1960: 42)

除了语文知识、政治新闻与政治言论,《马来语月刊》也刊登了许多马来文艺的作品与评论文章的译稿,这当中包括马来青年诗人阿敏(A. S. Amin)的诗与马来语文菁英伊斯迈胡先(Ismail Hussein)的稿。例如阿敏在创刊号发表一首诗歌〈野孩子〉(Nakal-nya sa-orang anak)。根据创刊号的〈编后话〉,这是作者特别为《马来语月刊》写的稿件。《马来语月刊》积极地与马来文化界沟通与合作,除了刊载他们的稿件,还获得几位马来文学界重要的作家来函鼓励与指正,例如哈伦(Harun Aminurrashid)、沙末萨伊(A. Samad Said)等,其中前者更是建议,作为双语刊物的《马来语月刊》可以把华文罗马字母化,俾使不谙华文的人可以透过马来文来学习华文。(〈我们收到的信〉20/6/1960)以上所述,显然鲁白野时期的《马来语月刊》与马来文化界有着积极的互动,这是往后接替鲁白野位置的主编<sup>15</sup>,如刘正朝和陈妙华,比较少见的情况——当然,这并非说他们没有刊载译稿,而是指他们基本上并未向马来作家邀稿,或者说并没有马来作家专为他们供稿。因此,鲁白野之后的《马来语月刊》大致上是单向地透过译介的方式与马来社会和文化联系。

鲁白野的《马来语月刊》之所以得到马来文化界注意,一方面因为他本身向来就与他们互有往来,另一方面也不排除阿都拉胡赛因的参与起了一定的作用。无论如何,更重要的疑问是:这份双语刊物的华巫联合编辑模式是如何运作的?在已出版的《马来语月刊》中无法找到任何讯息。然而,在《马来语月刊》停刊十余年后,阿都拉胡赛因出版他的回忆录《旅程》(Sebuah Perjalanan),为我们披露他参与《马来语月刊》的经过。

根据阿都拉胡赛因的叙述,他认识一名在《星洲日报》当编辑的华



裔青年Lee Hwa。这名青年后来与他联合编辑了一本名叫*Bahasa*的双语刊物，出版社是World Book Company, Singapore。从上述资料看，这位Lee Hwa无疑就是鲁白野（本名李学敏），而那份刊物其实就是《马来语月刊》。透过阿都拉胡赛因的记述，有理由相信他应该不曾跟世界书局有过任何往来<sup>16</sup>，一切编务都是直接与鲁白野交涉。之所以如此，可能跟《马来语月刊》的编辑工作并非全职有关。根据后来接鲁白野职位的陈妙华（2005）的回忆，当时她在《星洲日报》经理部任职，每次编好稿后就送到世界书局，再由书局负责人寄去香港排字排版。由此来看，《马来语月刊》并没有设立固定的编辑室，而是由书局委托给一个以兼职的方式负责编务的人全权处理。由此可以推断，世界书局把编辑工作交给鲁白野，后者则动用他的人脉寻找其他人的合作与帮忙。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阿都拉胡赛因加入《马来语月刊》成为联合编辑。尽管是挂上了联合编辑之名，但阿都拉胡赛因基本上并没有实际参与编务，组稿、写稿、构思的人都不是他，但是鲁白野每次在编好稿后都会寄一份马来文的校样本给他过目，因此他还是掌握了一定的审批稿件的权利。<sup>17</sup>

## 五、语言意识形态之争：一语或多语？

以上梳理了鲁白野透过史地书写与国语运动的参与，在历史关系、阶级认同与语言推广三个方面，探索出一个马来亚国族想象的可能性。然而，一个问题是，在这个多语言的环境下，他如何处理各语言之间的关系与位置？换句话说，他的语言意识形态究竟是如何的？这会跟与他合作无间的马来语文菁英一致吗？就这个问题，以下以《马来语月刊》的一篇文章所引起的小争论谈起。

《马来语月刊》第二期刊登了伊斯迈阿末（Ismail Ahmad）的一篇稿件，题目为〈必须拆毁言语的障壁〉（*Tembok Bahasa Harus Di-hapuskan*）。该文首先提倡双语之间的互译之必要，使得双方都可透过文学的翻译来认识对方。作者相当清楚当年南洋大学学生在马来语文领域的文化实践。然而，对他来说，翻译尽管是个重要机制，却不是解决语言带来的障碍的长

久之计。他认为要解决此问题，必须全面地推广国语，使它成为所有人共同的语言，并在未来创造一个单一语言的文化与文学。

翻译作为马华艺术与马来文学的接触点；作为同是这独立国的国民之华族与马来同胞的情绪、思想与见解的接触点，还不是我们最终的理想。

显然，我们的艺术作品与文化不久将是不会再被马来语与华语分裂为两大阵营了。

广泛地教导国语，与国语之传播开去在将来成为**本国唯一的言语**，于是，我们就要努力务使我们的文艺与文化将来是**只使用一种言语**，即我国的国语。

(Ismail Ahmad 20/2/1960: 10; 粗体字为引述者强调)

伊斯迈阿末的言论并非孤例，他实际上代表着长期以来主流马来语文菁英所推崇的一套民族主义构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Satu Negara, Satu Bangsa, Satu Bahasa），本文称之为“一语多元文化”主张，或曰“单一语言意识形态”。这一套论述，在后来马新分家之后，由马来西亚的马来执政菁英与语言菁英维护下去。1971年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大会<sup>18</sup>，议决了国家文学的定义：

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必须被定义为以马来西亚文（Bahasa Malaysia）书写的文学作品，并且其内容必须以马来西亚不同社会的生活为背景。

(Kementerian Kebudayaan, Belia dan Sukan 1973: 527; 笔者自译)

因此，要被承认为“国家文学”，作品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书写语是国语；二、必须以马来西亚为背景。尽管此定义往后在马来文化界小有争议<sup>19</sup>，但基本上在不同的理论家手中流转之后，“国语”的书写条件维持不变。无论如何，从上述两项条件来看，国家文学显然是一个“一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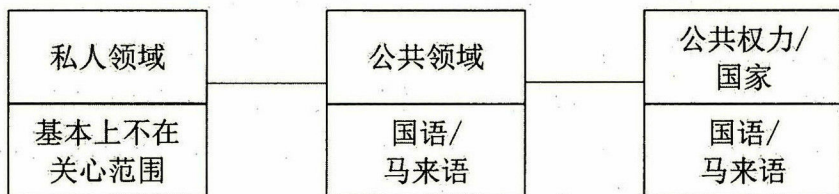


多元文化”的方案，这里所指的乃是在独尊国语之外，它强调了“马来西亚不同社会的生活为背景”的一点，在内容上承认了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社会的现实。另一方面，马来语文菁英多年来也不断努力培育非马来人参与马来文学的创作，以呈现国家文学多元化（就参与者与其所书写的内容而言）的一面。例如伊斯迈胡先就渴望更多非马来人参与到马来文学的创作中，以改变马来文学的单一同质性<sup>20</sup>：

它对未来造成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打破在马来西亚现有马来文学世界的单一同质性，后者多年来一直被囚禁在马来—伊斯兰思想世界的传统中。（按：在非马来作家的参与下）马来语文学无法避免地充满异质性，能够更开放地阐述华人—佛教、淡米尔—兴都教与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世界。

（1982：6；笔者自译）

这样的单一语言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文化多样化的主张，然而由于其政治考量，导致了他们对翻译机制（特指国内情况而言）的敌视态度。所谓政治考量，即是担心翻译的机制会破坏国语的推广与普及化。一个具代表性的言论来自第十届国家文学奖得主安华利端（Anwar Ridhwan），他的想法大体上与前述的伊斯迈阿末无异。1988年12月11日隆雪华堂主办“各族群文学营”（Kem Sastera Pelbagai Kaum），安华利端受邀出席并发表演讲，在谈到翻译问题时，他认为，翻译的工作是有必要继续下去的，但这最好只是在初步阶段执行，因为我国缺乏翻译者、而且编辑过程耗时、发布网络也不完善，结果导致读者无法第一时间目睹著作风采。因此他认为，如果国民教育体系成功了，国人都熟练地掌握国语，那么大家就可以直接用国语进行创作，而不需要依赖缺点多多的翻译机制。（Anwar Ridhwan 2/1989：55）这一类观点，其实并不干预个人层面的语言使用，却希望一统公共领域的语言（但并无意在文化上取消族群的差异），然后透过单一的语言创造统一的国族，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建设一个稳固、团结、进步的国家。这样的语言观点，可参考下图：



鲁白野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因此在该期的〈编后话〉（Dari Meja Pengarang）对伊斯迈阿末的文章做了一个简短回应：

我国是个多种族，多语言的国家。在本期发表的Ismail Ahmad的评论〈必须拆毁言语的障壁〉，就是论我国已发生的语言问题。在建立马来亚文化的这个最初阶段，有些人以为，马来亚文化就是马来文化，不必再浪费时间与笔墨去理论。有些人则以为，言语与文字不过是传达人类思想的媒介，换句话说，马来亚文化是侧重质的方面之建设，即侧重灌输对马来亚效忠的爱国思想。至于语言与文字，不过是形式的问题。**在我国全民拥护以马来语为国语的大前提下，各族应该仍可用其母语与文字创作的。**

（〈编后话〉20/2/1960：42；粗体字为引述者强调）

相对于马来语文菁英的一语多元主张或单一语言意识形态，鲁白野则是支持公共领域的双语/多语方案，至于国家层面或国族身份的表征则独尊马来语/国语。因此，国语的掌握是作为一国之爱国公民不可拒绝、质疑的，这在他的另一篇〈编者的话〉清楚言明：

是的，言语是民族的灵魂。而认真与热烈学习国语，是我们人民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

是的，国语在代表着祖国与人民的尊严。国语在我国将来的政治、经济、外交、贸易与社会上不但将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且将是促进我国各族的互相了解与团结之**最重要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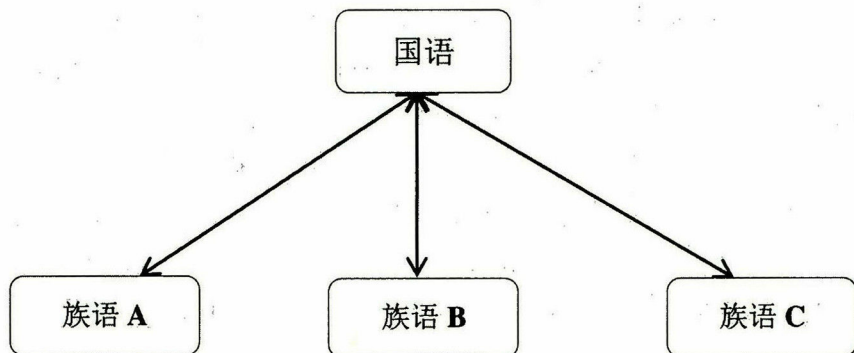
（〈编者的话〉20/8/1960：3；粗体字为引述者强调）



在鲁白野看来国语/马来语的地位是超然于国内其他一切语言的，包括了华语在内。而其超然地位，体现在包括政治、经济、外交、贸易与社会等诸领域。而这种重要地位不是现成的，是未来式的（“将具有……且将是促进……”），因此是建构出来的。而对人民来说，爱国主义的表现就必然包含爱国语，因此也必须学习国语、推广国语、使用国语。如此一来，国语所具有的工具功能与认同功能，使得它天生具备了某种其他并未取得国语地位的语言所无法企及的超然性，即涵盖全国各个层面——跨越各领域、族群、文化、宗教、乃至语言等的公共功能。然而，必须特别指出，在当时的鲁白野，“公共性”这个概念，往往是被理解为“建构国族”，因此也就局限于“互相了解”以达到“团结”的范畴，而不是视为一种透过公开批判与讨论来检验意见或立场的“批判的公共性”。故此，对鲁白野而言，马来亚国族的创建有两种方法，要么直接使用国语来书写，要么借助“翻译”来完成，俾使各族之间能够“互相了解”。

在另一方面，在肯定国语的重要地位之外，鲁白野认为华语是华人的母语（族群语言），因此不能轻易放弃，例如在他过去许多谈到峇峇社会的文章，都肯定峇峇华人的“再华化”现象。在〈和平老人林文庆〉一文，他就那么肯定林文庆：“虽然是个侨生，却从来不曾像别个侨生一样藐视祖国文化，相反地，他还能在公余拨冗致力推展国语教育及发扬孔子学说……”（鲁白野1953：21）文中的“祖国”、“国语”都是指“中国”、“华语”。

因此，对鲁白野而言，华语和马来语尽管有着不同的语言地位，但却同时是马来亚华人的认同对象，国语推广与族语使用不必然是二元对立或存在竞争关系，二者是可以互相协和运作的。进一步地说，所谓的双语/多语公共领域有两个意涵，一方面是就公共领域自身而言，必须允许多语言共存的情况；另一方面，就马来亚华人而言，必须同时掌握华语与马来语，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公开使用这两种语言。<sup>21</sup>而在这样的双语/多语意识形态之下，一国之内的语言关系<sup>22</sup>如下：



在原则上，这是上下结构的语言关系，由于族语主要被定位为族内沟通语言，而国语则是跨族沟通语，因此各个族语之间在原则上就不必建立直接沟通的管道（翻译），而只需要透过处于中心位置的国语取得间接联系即可。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上下结构约限了国语在公共领域的彻底垄断格局（即否决马来语菁英的单一语言意识形态），但却无法避免地还是促成了语言关系中心化的问题，即国语（中心）相对于其他族语（边缘）凝聚更大的政治权力。

## 六、结语

1961年，在编了十七期的《马来语月刊》之后，鲁白野突然因病逝世。在此之后，国语运动的趋势因各种因素渐渐地走下波。1965年马新分家，新加坡自1967年之后，开始转向注重英语教育。（郭振羽1996）马来语作为国语名存实亡，没有实际的地位，人们也渐渐地失去当初对它的学习热诚。至于马来西亚，自1969年513事件之后，从70年代开始，当时的联盟政府启动了以马来—伊斯兰为核心的国族建构方案。在此情况下，华人社会出现了重大的意识转变，从过去的“国家”转向了“族群”，并透过对自身社会性文化机制的捍卫与创造，来对抗、冲击以马来人霸权为主导的国族建构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与巫之间的差异被强调、扭曲乃至夸大，从而导致一种二元对抗的“华—巫”结构。这也是说，华社经历



了从二战后国家独立期间，把马来人/文化内在化以建立马来亚国族的努力遇到挫败后，转向将其排除在外的他者化过程。如此一来，曾经一度掀起风潮的学习国语运动，也因为马来语被他者化而无可避免地平息下来了。当年华社的双语菁英所推崇的双语/多语公共领域的语言意识形态遭遇了挫败——如前所述，所谓双语/多语公共领域有两个意涵，首先是公共领域自身必须是多语共存的，而这在后来基本上是保持下来了。其次，则是同时能够运用国语与华语的华人写作群体，然而由于前述的原因，这个计划是失败了。<sup>23</sup>

鲁白野与其他双语菁英，他们与马来语文菁英的冲突，主要还是出现在对公共领域的语言使用方面，换个说法，双方都认同于以马来语作为国语，且国语被视为国内最重要的语言，是各族群的共同认同对象；然而，在涉及到各种语言之间在公共领域的地位安排时，双方却有了不同的坚持立场，一个坚持多语，另一个则认为必须一统多语言为单一语言。对马来语文菁英而言，唯有国语（马来语）作为全国通用语才具有正当的公共性，因为它可以跨越差异（即语言的障壁）从而保障公众的、国家的利益（透过建立单一语言的国族来达到这个目的）；在某个程度上，翻译机制被视为是破坏国语推广。至于华社的双语菁英，则认为族群语言（华语）同样有其公共性，尽管在范围上华语的通用程度不比国语，但它是作为华族文化的传播与创造的媒介。从这样的分析来看，尽管华社在50、60年代曾经掀起学习国语运动，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与马来文化界有着互动与合作关系，但他们在语言意识形态上的见解，是有相当大的差异，乃至冲突的。

## 注释

- 1 当时关于“马来亚文化”的讨论，即便在华社内部而言，也不能轻易地一概而论。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间有着一定的竞争关系，这尤其是在冷战格局下，左右之间的竞争起了相当的影响作用。例如，独立前《蕉风》的马来亚国族想象，当时编者所关注的是脱离殖民统治后的马来亚，在其国族与文化上是否能够达到真正意义的“独立”，即一方面以反共立场抑制左翼势力，从而防范本邦华人成

- 为中国政治附庸。另一方面，则避免成为马来族群的从属，认为“马来亚化不等于马来化”（林春美2012）。
- 2 关于当年华社学习国语的概况、南大生的参与等，可参考庄华兴（2004；2008）、杨贵谊（2006；2014）、周维介（2014）等。
  - 3 这不仅是指其所涉及的对象（不同国家主体、语言），还包括了“语”和“文”之间的影响层面。华语运动基本上是在多语言的华社内部（粤语、闽语等）建立一个在“语”层面的共通语言。然而，这不表示“文”（白话文运动）的变革对“语”的层面的变化是没有影响的。恰恰相反，“文”的变革也提供了“语”的变革的契机。（徐威雄2012）无论如何，这跟马来语运动的情况非常不一样，对华社而言，后者基本上同时牵涉到“语”和“文”的彻底性变化。
  - 4 第二重历史意识转移重点则表现在“争取民族的主体性”上，并促成了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的学术转向。相关论述见廖文辉（2011）。
  - 5 鲁白野与南洋研究之关系，可以这个例子说明。在一篇文章中，他把柔佛古名“乌丁礁林”视为是出自马来文“乌戎丹那”（意即大地的尽头）。（鲁白野1954a：23）这一说法其实来自许云樵考据的结论。
  - 6 例如在《马来散记》的〈序〉提到，“……在这三个阶段中，我们都能够维持着中马两大民族间的亲密的和平友谊，相信我们还能发展它。”（1954a：2）
  - 7 例如，在〈和平老人林文庆〉中这么说道：“他虽然是个侨生，却从来不会像别个侨生一样藐视祖国文化，相反地，他还能在公余拨冗致力推展国语教育及发展孔子学说……”（鲁白野1953：21）文中的“祖国”和“国语”都是指“中国”和“华语”。
  - 8 其实还有第四个看法，即史学的借鉴功能，可参见鲁白野（1954b：152）。但这与本文论题无直接关系，就不加以讨论。
  - 9 必须补充说明一点，鲁白野的史地书写在相当程度上透露了他在反思殖民主义话语方面并不彻底，他几乎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殖民地知识体系所建构出来的懒惰马来人与勤劳华人的刻板印象，例如在〈十九世纪的星洲华侨〉一文，就大量转引十九世纪殖民者、作家、商人的论述，其中包括“一个华侨，相等于两个印度人或是四个马来人。”之类的，参见鲁白野（1953：7-8）。因此，若把二战之后的南洋研究当作是独立前后去殖民化过程来看待，则我们对南洋研究论述本身的批判性分析，例如追究其是否被殖民话语所内化、宰制，是有其必要的。
  - 10 《满刺加国译语》并未注明出版年份，按杨贵谊估计应该是成书于1403年至1511年之间。以下关于华人参与马来语言文化的历史，整理自杨贵谊（2014）。
  - 11 鲁白野如何掌握马来语？他曾在文章中提到自己是峇峇，其祖母则是娘惹（鲁白野1953：24；89）因此，鲁白野本身很可能自小就掌握了一些峇峇马来语，但这些能力还不至于让他可在更高层次上运用马来语。他仅有小学五年级的学历，因此他的马来语文能力很可能是靠自修或在校外跟别人学来。他在另一篇文曾提到他学习马来文用的第一册课本是文西·鸭都拉著的《鸭都拉自传》。（鲁白野



- 1954b: 166) 鲁白野应该是在印尼期间或之前就学好马来语, 因为他在印尼期间曾经参与印尼文学的活动, 并认识了印尼诗K安华。他不仅熟练地掌握华语与马来语/印尼语, 而且英语能力相信也相当好(否则无法编三语的《实用马华英大辞典》), 此外他也曾经跟人学习过“沙盖”(即原住民)的语言, 一度掌握一千多个沙盖语的单字, 但后来渐渐地给遗忘了。(鲁白野1953: 69)
- 12 鲁白野的作品除了《春耕》、《流星》之外, 其他都由世界书局出版, 这包括了重要的推广国语出版物, 如《实用马华英大辞典》、《马来语月刊》等等。当时世界书局是其中一家积极参与国语运动的出版社。另一家则是上海书局, 出版了大量双语、译介等读物, 包括双语刊物《国语月刊》(Bulan Bahasa Kebangsaan)。上海书局的出版资料可参考陈蒙志(2012), 唯该文有两处错误, 第一、《国语月刊》并非“当时市面上唯一的以华语为媒介语学习马来文的综合性期刊”, 世界书局出版的《马来语月刊》的创刊更早于《国语月刊》。第二、《国语月刊》是在1964年停刊, 因此并不是文中所指的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 国家语文政策因此改为提倡英文, 导致学习马来语热潮下降而停刊。
- 13 阿都拉胡赛因马来小说家, 出生于北马, 在二战期间曾渡海到印尼, 曾一度在印尼担任过兰沙县(daerah Langsa)县长。此后他曾先后逗留过泰国、新加坡。阿都拉胡赛因曾学习过华文, 但并未真正地深入掌握。见Abdullah Hussain(1984)。阿都拉因其备受争议的《连环扣》(Interlok), 而为华社所注意, 相关事件报道可参《当今大马》(2011)的报道。
- 14 有一点相当矛盾的是, 在第六期却提到: “像在创刊号中已讲过的, 我们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尽一点国民责任, 协助提倡国语, 帮助我国华族同胞学习国语。这是我们唯一的工作方针, 也就是我们编辑与出版总路线。”(〈编者的话〉20/6/1960: 3) 遗漏了第二个宗旨。
- 15 鲁白野编了第十七期《马来语月刊》后不幸辞世, 月刊也被迫暂时停刊, 后来世界书局老板周增钧请杨贵谊帮忙, 但后者正准备出发去印尼深造, 只好转为委托南大毕业生Low Hang(刘正朝, 笔名刘汉)接手。刘正朝接手后编务不太顺利, 拖了几个月才出版第十八期, 往后第十九和第二十期都是隔两个月才出版。此后他请辞, 《马来语月刊》交由Ting Noh(即陈妙华)接手, 陈妙华在获得杨贵谊的协助下, 从1962年起担任《马来语月刊》主编, 直至该刊物于1970年4月20日停刊为止。相关编辑职位内部的调任细节, 可参杨贵谊(2006)、陈妙华(2005)。
- 16 在鲁白野去世多年后, 阿都拉胡赛因从吴天才口中获知, 原来在鲁逝世后《马来语月刊》仍持续出版, 并且在没有征求他同意下继续挂着他的名字, 先后与Low Hang和Ting Noh成为联合编辑。他知道后相当紧张, 因为担心如果杂志刊登了反政府的内容会牵连他。(Abdullah Hussain 1984: 344) 这段文字记述显示, 世界书局与阿都拉胡赛因双方应该并无任何直接往来, 否则就不会发生上述的事。

- 17 “……以前Lee Hwa还在时，每篇刊登的稿件，他都会在事先跟我讨论过，我说可以，他才会刊登，如果不可以，就不刊登。”（Abdullah Hussain 1984: 344；笔者自译）但我们无法探悉具体的操作究竟是如何，例如《马来语月刊》尽管大部分文章都以双语呈现（中译马或反之），但也有一些文章只有中文，如此一来，究竟鲁白野在与阿都拉胡赛因审稿时，会不会也把相关文章内容转达给对方知道，我们无从知晓。
- 18 国家文化大会于1971年8月16日至20日在马来亚大学召开，会议拟订三大原则，分别是：一、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必须以本地区原住民文化为核心；二、其他合适与恰当的文化元素可考虑被接纳为国家文化；三、伊斯兰教是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元素。（Kementerian Kebudayaan, Belia dan Sukan 1973: iv）其中又特别声明，第二原则的合适与恰当，是以不违反第一与第三原则为前提。
- 19 例如Yahaya Ismail（1981）就认为，作家的出国经验使得他们可以以外国为创作背景，然而国家文化大会议定的国家文学定义无法涵括这些作品。
- 20 渴望非马来人参与马来文学的呼吁，至千禧年之后仍然一再重提，例如Mohamad Saleh Rahamad（1/2003）的这篇文章，此可见马来语文菁英们对高度单一化的马来/国家文学的忧虑。
- 21 双语/多语写作的主张，于半世纪后引起庄华兴与黄锦树之间的激辩，当中的课题牵涉到国家文学、双语写作等，相关论争见庄华兴（2006）。庄华兴的双语写作构想，基本上是延续自上世纪50、60年代的华社双语菁英的精神。
- 22 为方便分析，这个语言关系图暂时排除了英语。若加入英语实际上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双中心关系，从而也必须纳入殖民主义（当中不只是殖民者，还包括英化的被殖民者）与国际视角来讨论。
- 23 尽管多年来仍有一些非马来作家（华裔、印裔等）以马来文作为表达的工具，但是在人数上并不尽理想。如果当年的双语方案成功，今日的马来文坛必是呈现多元族群的格局，则马来语文菁英/作家也就不必多年来不断地呼吁非马来作家参与马来文的创作了。

## 参考文献

### 中文：

- A.S. Amin 20/1/1960. 〈Nakal-nya Sa-orang Anak野孩子（诗）〉。《马来语月刊》创刊号：11。
- 〈编后话〉20/2/1960。《马来语月刊》第二期：42。
- 〈编者的话〉20/3/1960。《马来语月刊》第三期：2-5。
- 〈编者的话〉20/6/1960。《马来语月刊》第六期：2-3。
- 〈编者的话〉20/8/1960。《马来语月刊》第八期：2-3。



- 崔贵强2007。《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修订卷）。新加坡：青年书局。
- 陈妙华2005。〈意外当编辑〉。韩山元等编（2005）。《诗书滋味长——大众集团八十周年特刊》。新加坡：大众控股有限公司。
- 陈蒙志2012。〈上海书局历史中的时代印记〉。《学文》第二期：60-81。
- 周维介2014。〈星满苍穹——半世纪前新加坡的马来文天空 从“英语是新加坡的国语”说起〉。《怡和世纪》第二十二期。
- 东姑阿都拉曼20/1/1960。〈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马来语月刊》创刊号：4-6。
- 《当今大马》2011。〈《连环扣》充斥马来主权意识，47民间团体反对列文学课本〉。21/10/2015浏览，<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60078>。
- 〈发刊词〉20/1/1960。《马来语月刊》创刊号：2-3。
- 方修1986。《马华新文学简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 \_\_\_\_\_1987。《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 郭振羽1996。〈语言政策和语言计划〉。云惟利编（1996）。《新加坡社会和语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 Ismail Ahmad 20/2/1960。〈Tembok Bahasa Harus Di-hapuskan必须拆毁言语的障壁〉。《马来语月刊》第二期：4-11。
- \_\_\_\_\_1953。《狮城散记》。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
- \_\_\_\_\_1954a。《马来散记》。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
- \_\_\_\_\_1954b。《马来散记续集》。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
- \_\_\_\_\_1958。《马来亚》。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
- \_\_\_\_\_1959。《印度印象》。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
- \_\_\_\_\_1959。《实用马华英大辞典》。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
- 林春美2012。〈独立前的《蕉风》与马来亚之国族想像〉。《南方华裔研究杂志》第五卷：201-208。
- 楼文牧1957。《马来民族的诗》。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
- \_\_\_\_\_（不详）。《爱诗集》。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
- 廖文辉2011。《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威北华1955a。《春耕》。新加坡：友联图书公司。
- \_\_\_\_\_1955b。《流星》。新加坡：南洋印刷社有限公司出版。
- \_\_\_\_\_1959。《黎明前的行脚》。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
- 〈我们收到的信〉20/6/1960。《马来语月刊》第六期：26-30。
- 徐威雄2012。〈马新华语的历史考察：从十九世纪末到1919年〉。《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十五期：85-124。
- 杨贵谊2014。《华马文化论丛》。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庄华兴2004。〈南大学人与马来语文发展：廖裕芳和杨贵谊的贡献〉。载《南洋大学

史论集》。八打灵再也：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2006。《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吉隆坡：雪隆兴安会馆与大将出版社联合出版。

2008。〈马来西亚华裔作家与现代马来语文学〉。《中外文化与文论》第二期：112-128。

章星虹2013。〈战后初期的许云樵：搭建南洋研究的普及平台——以《南洋杂志》和《马来亚少年》为考察对象（1946-48）〉。载《百年寻绎：马新历史人物研究》。八打灵再也：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

### 马来文：

Abdullah Hussain 1984. *Sebuah Perjalanan*.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Anwar Ridhwan 2/1989. Proses Memahami Pengucapan Sastra Dalam Konteks Sastra Kebangsaan. *Dewan Sastra*: 54-55.

Ismail Hussein 1982. Perkembangan Sastra Kebangsaan: Peranan Gerakan Masyarakat, Institusi dan Penerbitan. Diselenggarakan oleh Zahrah Ibrahim 1987. *Perkembangan Sastra Kebangsaan: Esei/Kritikan Pemenang Hadiah Sastra (1982-1983)*.

Kementerian Kebudayaan, Belia dan Sukan ed. 1973. *Asas Kebudayaan Kebangsaan*. Kuala Lumpur: Kementerian Kebudayaan, Belia dan Sukan.

Mohamad Saleeh Rahamad 1/2003. Cereka Penulis Pelbagai Kaum di Semenanjung Retrospektif Selepas Tiga Dekad. *Dewan Sastra*: 11-19.

Yahaya Ismail 1981. Persoalan Latar Belakang Sastra Malaysia. Anwar Ridhwan (penyelenggara). *Di Sekitar Pemikiran Kesusasteraan Malaysia (1957-1972)*.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